



家庭从来不是独立人生的“对立面”，而是天然的互助单元与风险缓冲垫。
成年的标志从来不是“离家独居”，担当责任、维系亲情、立足生活，才是大众认可的成熟定义。

外州学生在学费方面与国际学生类似，每年约2.5万到5.5万美元——部分知名头部高校学费更高，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外州学生学费约4.3万美元。

随着进入21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通胀加剧——2020年至2026年累计通胀达30%，一些新毕业的年轻人感受到了相当大的经济压力。在李爱铭看来，美国青年选择与父母同住者大增的原因，主要在于近年来美国高通胀、就业不稳定，以及大城市住房成本高企。“美国年轻人发现自己难以负担独立生活开支，只得被迫延长在原生家庭的停留期，个体独立周期被拉长。传统上，欧美社会代际之间的边界意识比较强，对成年后仍然与父母同住的人，社会评价多带有对个人发展受挫的负面暗示。”

李爱铭说：“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来看，传统中国家庭属于‘大家庭’模式，成年子女成家育子后仍与父母共居，代际同住是家庭生命周期里本就有的常态安排，承担养老、育儿、生产互助等多重功能。而美国长期以小家庭为基准，子女成年后独立迁出、与原生家庭保持空间分离，是社会默认的生命周期节点，独立被视作个体成熟的标志。”

李爱铭认为，当代中国代际共居不再是传统伦理强制要求，而是家庭自主协商的弹性选择。青年主动返乡创业等，也促进了此类现象的发生。这种现象本质是现代化进程中，中国家庭生命周期形态的多元化演变。

利弊特征十分鲜明

宇平说，他刚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暂时没有找到合适

的工作，也曾在老家住过一阵子。“那时候，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！因为村里有老人是这样理解的：既然大学毕业了，就是‘国家干部’身份了，为什么会回到村里？是不是犯错误被开掉了？”宇平回忆。

李爱铭分析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跻身一线城市打拼、扎根异乡，是社会公认的成功、“有出息”的核心标志，而这份成就往往需要以亲子异地分离、割舍家庭陪伴为代价。“彼时，独居被赋予独立、自由、成熟的正向标签，年轻人主动脱离原生家庭，以此证明自我价值。但随着独居生活的常态化，年轻人逐渐发现，独居不等于真正的自由，反而要独自承担高昂房租、生活琐事、职场压力与情绪内耗，长期独居带来的孤独感、无依感，让独立的成本远大于收获。”

她观察到，在初婚年龄推迟、组建新生家庭的周期不断拉长的背景下，年轻人不再执着于“异乡扎根即成功”的固有认知。尤其是独生子女，从小独享父母照料，成年后返乡生活，成为兼顾事业发展与家庭照料的理性选择，真正实现了事业尽业、尽孝尽亲的“忠孝两全”。

日本电影《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》探讨了与母亲共同生活的幸福。

